

《羊年契约文书》及其成书年代考

全荣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羊年契约文书》是黑城出土的 14 世纪蒙古文文书。该文书第一行写有《羊儿年正月初五》,据其内容,应该是一件民间交往的契约文书。因此,本人把这份文书暂定为《羊年契约文书》。中国古代一般用“天干地支”纪年法,60 年一循环,但该《羊年契约文书》只记地支,未写明其天干。所以,仅依据“地支纪年”来确定此文书写成的具体年代有一定的难度。根据《羊年契约文书》的内容以及与其相关的汉文文书互相对比,结合文书中出现的个别专用名词,比如司属衙门的名称等,与有详细纪年的文书相比较,结合天干地支纪年法,推断该契约文书书写的具体年代。

关键词: 羊年; 契约; 文书; 年代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黑城,蒙古语称哈拉浩特(qar-a hota)^①,是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isinai cUlge)^②衙署所在地。黑城地处额济纳河下游,属于纯内陆性沙漠地区,气候异常干旱,有利于古代居民所使用过的纸张、草木、毛皮和丝织品等的保存。黑城出土文书中的元代文书(包括北元文书)对研究有元代(包括北元)的历史以及西北史地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陈高华先生曾撰文呼吁相关学人对这些文书给予充分认识,“黑城元代文书对于元史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我们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期待有新的发现”。^[1]

本文以黑城出土的元代蒙古文文书《羊年契约文书》(qonin jil-un gereci bicig)为研究对象,以较清晰的《羊年契约文书》照片为基础史料,同时结合语言文字学、佛学、西夏学等方面的知识,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该文书进行比较和考证,缜密地分析该文书的书写内容、历史背景等问题,考查该蒙古文文书的书写年代。

—

早在 20 世纪初,不少国外探险家就对神秘的黑城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考查。俄国的科兹洛夫(P.K.Kozlov)于 1908-1909 年率领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探险队到中亚及东部藏区进行了考察,并在黑城遗址发现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多种文字记载的古文献,其中包括珍贵的汉文、西夏文对照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及《音同》、《文海》等古籍^③。这一重大发现轰动了考古界和史学界。在 1909 年的探险和发掘中,科兹洛夫带领的考察队收获的东西“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有书籍、信件、金属钱币、女性饰物、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佛像以及其它物品。用数量来计算,收获是满满的沉沉的十个邮箱的物品。后来,把这些东西寄给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和俄国科学院。”^[2]1914 年,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带领的考察队在黑城发掘出了为数不少的文书。^④科兹洛夫与斯坦因在

黑城获得大量文书的消息公布后，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和史学界的轰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于 1914 年发表《科兹洛夫考察黑城所获汉文文献考》一文，对于科兹洛夫所获得的 23 件黑城出土汉文文献作了介绍和研究。^[3]新中国成立后，额济纳旗最初归甘肃省管理，后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和甘肃省考古队（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分别于 1962-1963 年^⑤和 1976-1979 年在黑城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出了少量的出土文物，但未能对其原文进行充分的研究与公布。此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组成考古队，于 1983 年 9 月 10 日和 1984 年 8 月到 11 月，两次对黑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虽然这两次发掘的 1.1 万平方米的面积仅占全城总面积的 1/10，但已基本揭露出城内主要部分的建筑遗址，取得了黑城城址建置沿革和城市布局的考古资料，并且出土了大量的文书和文物。^⑥这两次发掘对辽、金、元三代的城址发掘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2001 年，内蒙古大学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研究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城出土的蒙古文文书。^[4]在近五年的研究中，双方共同释读了有关蒙古文献中蒙古文文书、八思巴文文书共 300 件。这些文书多为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文书、皇帝谕旨抄件、民间契约文书、占卜文书等。此项研究的开展对加强蒙古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进一步了解元代蒙古文文书的书写特征、语法结构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黑城出土文书内容非常广泛，涵盖了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些史料都是原始的文簿，能够与史书互相印证，但史书中却无记载，是最新的史料。黑城出土文书中，大多数是汉文文书和西夏文文书，与汉文和西夏文文书相比，蒙古文文书数量较少，研究情况不太活跃。如果与柏林收藏的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书相比的话，有分量的成果较少的情况就更加明显。

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可分为契约文书、行政文书、宗教文书和其他文书等类。其中，有一份编号为 F61: W 9; 整理编号为 No. 001 的竹纸上木笔书写的 14 世纪蒙古文文书^[5]。该蒙古文文书纸张大小 21.5x80cm, 38 行，每行 3-8 字，共 116 字，墨印文字。从保存情况看，这是一份基本完整的契约文书，边沿稍微破损，但不缺字，完全能贯通其文义。第一行写着《羊儿年正月初五》^⑦^[5]，据其内容，应该是一件民间交往的契约文书。为研究方便，笔者把这份文书暂定名为《羊年契约文书》。

二

该《羊年契约文书》是民间交往的世俗文书，在用纸上没有太多的讲究，是在竹纸上书写的，书写人文字水平不高，字迹不够规整，字迹粗陋，多用民间口头语言，文字讹误较多，不易通读理解。墨色浓，有涂改，行草写就。首行写：《羊儿年正月初五》，下有收大麦、小麦若干石、斗、升等量词和总管府、佃户、两屯百户所等记载。元代契约存世不多，其中民间契约经济文书更是少见，根据现存部分契约文书可以大致看出元代契约文书的书写格式，有证人数名、达鲁花赤官方见证人、抵押物，签约双方等，并且还存有当事人署名画押的明显的时代特征。文书格式为开头顶格写“xx 年（年款）xx 立”，正文末尾另起一行书写年月日及书写文字一方姓名，再另起一行书写知见人姓名，均画十字押。由得到钱财一方签字画押便可生效，不必经过官司盖印核准，如以后发生纠葛不按契约实行时，就可凭原订契约向官司上诉。

《羊年契约文书》内容为：斡失火亦立(ousi qoyili)^⑧与他的(两个)儿子怯怕(kebeg)和索竹鲁(sUjUIU)，收领到咩布唆儿竹(mibU sulju)^⑨的十石小麦^⑩和十石大麦^⑪。与此相应，他们也把(自己的一块)土地作为抵押品(担保物)〈暂时〉提供〈提交〉给了对方。再根据第 16 行至第 21 行的字句(条款)，这项合同的具体内容为，斡失火亦立以

抵押品（担保物）的名义提交给咿布唆儿竹的那片土地，在五年之内仍由斡失火亦立耕作使用。在这五年期限之内，从这片土地上取得的所有收获，斡失火亦立每年只能从中留取一石小麦和一石大麦，除此以外的收获，全部属于咿布唆儿竹。但五年的期限终结之后，这片土地将返还给斡失火亦立。除此以外，在第 26 行至第 27 行还有一条相关内容：作为担保物而抵押的那片土地，〈在抵押期间〉所需支付或承担的水渠使用费、捐税、服役，皆由斡失火亦立承担。但是对于第 29 行至第 31 行所说的地租（五年地租）问题，表示的是其出处，还是表示已经以实物收取，或者表示承担支付地税的责任等并不明确⁽¹²⁾。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特别是沿额济纳河下游地带能耕种的土地是有限的。屯田面积虽大，但土地并不肥沃，生产技术落后，只能是广种薄收。在有限的土地上生存的农业居民，对于土地的占有欲当然要比提高农耕技术的欲望强烈得多，因此，亦集乃出土文书中所见有关土地纠纷案件的文书因此也就不少。由于天灾人祸，经营土地的农民负债累累而无力继续经营时，只得被迫典质土地。

三

据考察，《羊年契约文书》使用的不是完整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也不是年号纪年法，更不是公元纪年法，而是地支纪年法，没写明天干。我国古代的纪年法比较复杂，曾经使用过“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生肖纪年法”等。其中，“干支纪年法”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纪年方式之一。“干支”是天干，地支的合称。“干”指天干，共有 10 个符号：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支”指地支，共有 12 个符号，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干和支组合干支，用于纪年。按此排法，当天干 10 个符号排了六轮与地支 12 个符号排了五轮以后，可构成 60 干支。继续排下去又将恢复原状，“天干”和“地支”一一相配来纪年，60 年一循环，周而复始，即如民间所说“六十年转甲子”。“干支纪年法”是我国传统的纪年方法，它不受王朝更替和皇帝在位时间的限制，这种方法对历史年代的计算有准确且有连续性，因而更简便通用。但《羊年契约文书》采用的是地支纪年法，其上无年款，不知何年拟写的文书。单独依据地支纪年来确定此文书写成的具体年代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也不易断定其书写年代。

历书推算有严格的规律和程序，文书注记的每一项内容都有助于确定该文书的年代日期。黑城出土的蒙古文文书年代有早有晚，书写年代大多为蒙元时期，或向元朝以后略有延续。年代早者属于忽必烈汗执政时期，年代晚者为北元初期，时间跨度近百年。据黑城出土文书，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的最早有明确记载年代的文书是元贞元年（1295），最晚的是宣光元年（1371）。由于黑城出土文书的年代范围已定，再加上文书内容中出现的个别专用名词，比如司属衙门的名称等，与有详细纪年的文书相比较，基本上可确定该文书的年代。要确定其中所谓的“羊年”指的是哪一年，首先要断定该蒙古文文书是属于元代的还是北元时期的。根据其内容以及与其相关的汉文文书互相对比，再参考文书内容中出现的个别专用名词，比如司属衙门的名称或将文字内容与有详细纪年的文书相比较，可初步断定《羊年契约文书》是 14 世纪的蒙古文文书。

该文书发掘于亦集乃路总管府。⁽¹³⁾《元史·地理志》记载，亦集乃路在西夏时代为威福军所在地，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就已归附，但在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始设总管府，也就是这年才正式设置亦集乃路。因此，该蒙古文文书书写年代必定是在 1286 之后的。而且该文书开头写着“羊儿年五月初五”，因此最早也在 1295 年以后。在整个一个 14 世纪，共可遇有 8 个羊年（丁未 1307、己未 1319、辛未 1331、癸未 1343、乙

未 1355、丁未 1367、己未 1379、辛未 1391)。那么该羊年文书到底是上述 8 个羊年的哪一个羊年书写的呢？这就需要在断定大体年代的前提下根据所写的内容以及出现的个别专用名词来一一排除，最后断定其书写年代。《羊年契约文书》中有若干元代公文用语中特有的词汇，如“广积仓”等为富有时代特征的名词术语。即使文书残缺不全，只要有这些时代特征的词汇，都可大致断定其书写年代。如果很难从字面上断定年代，也可以根据同时出土的文书来断定。文书中也可看到不少当时通用的文字，有时同一篇文书中就可见到互换使用的情况。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中最早有明确记载的文书是《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中收入的《桑哥失里大王与卜鲁罕妃子》^[14]，这些文书均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蒙古语写的部分里明确记载为《moGai Jil》，在汉文写的部分里《延佑四年》（1317 年），因此在蒙古文部分写的《moGai Jil》指的是丁巳年，即 1317 年。据此，再进一步推断该《羊年契约文书》必定在 1317 年之后书写的，即可以排除丁未（1307）年书写的可能。

再从这份《羊年契约文书》的内容仔细析查，可知在“广积仓”^[15]一词以外还有“两屯百户所”^[16]等官衙名称。根据《元史·百官志》^[7]记载，诸路总管府下属机构，是泛指全国各路设置的机构，亦集乃路的下属机构是依据当地实际情况设置的，而且黑城出土汉文文书，编号为 Y1:W34 所载元统二年（1334）时设置了“广积仓”、“两屯百户所”等亦集乃路总管府下属机构。黑城出土文书 Y1: W30 所载元统二年（1334）的一份关于亦集乃路总管府下属司属文书中有“司属：广积仓、税使司、河渠司、巡检司、支持库、两屯百户所、司狱司、儒学、医学、阴阳学、僧人头目、答失蛮”等^[8]。因此，可以推断该羊年契约文书是 1334 年之后成文的文书。黑城出土文书中关于“广积仓”收支粮税的文书有 25 份，其中，“广积仓”最早收支粮税的记载的是乙亥年（1335 年）^[9]，最晚的记载是庚戌年（1370 年）。^[10]据考察，“广积仓”1335 年收支粮税的两份文书没有钤文，普通大黄纸上用毛笔书写，而左上角用汉语只写“白帖”两字。1335 年以后“广积仓”收支粮税的文书均以木刻版而上有八思巴文钤文。^[11]看来，“广积仓”成立初期，即 1335 年还没有公文文书。因此，可以排除 1335 年书写的可能性。那么推断符合条件的有 1343 年、1355 年、1367 年、1379 年等。在至治三年（1323 年）的 Y1: W131 文书上还称作“新附屯田军百户所”，可是在元统二年（1334 年）的 Y1: W30 文书上便成为“两屯百户所”，也就是将军屯和民屯合并在一起管理，管领村社农民的只能转移到各渠社长，而总管府可直接管领社长，屯田百户所的职能也就逐渐消失了。可是，《至正十一（1351）年考交钱粮文卷》F116: W555 呈碟中，又写作“屯田千户所”，可知当时已升格为千户；在同文卷其它文书中还记载要求各屯如实具报情况，这就是说屯田所的职能得到了强化，而且各渠设置了下属的屯田^[12]，那么可以排除 1343 年书写的可能性。

再分析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况。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顺帝退出大都，元朝覆灭。由于战乱，商业贸易受阻，本地不产的笔墨纸砚等日用物资，已无商家长途贩运而来。《明实录》太祖实录卷六十四所载，“洪武五年（1372 年）春季，明太祖朱元璋决心摧毁北元政权，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兵五十万，分三路进击……征西将军冯胜所率西路大军，以博友德为先锋，帅五千骑直趋西凉、永昌等地击败北元军队，又至山丹州，守将上都驴率所部吏民投降，再至亦集乃，守城大将伯颜帖木儿投降，并至瓜沙二州，所向无敌，扫荡了甘肃行省全境。”^[13]因此，大明军队占领整个甘肃省。据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载：“亦集乃路遗址中出土的北元纪年文书，只见有至正二十九年、至正三十年和宣光元年等三年内的文书，而见不着有宣光二年以后的纪年文书。这应与北元与明朝军队作战有关”。^[13]亦集乃路在这次战争中遭到明军袭击后，其居民被明朝强迫迁入内地。再据《明史》卷六十八所载，是年年末北元军队又重新占据了亦集乃城。这时的亦集乃城已经历了兵火之灾，居民已经被迁走，仅有驻

军，因此地方政权机关往来的公文也就不会再有，居民百姓间的交际往来书信和账目等也不会再出现了。因此，战乱时期，即 1367 年书写文书或保存不太可能了，可以排除。

据内蒙古考古所刊布的信息，从黑城发掘出一个青铜印。在这块青铜印上用八思巴文刻有“永昌等处行枢密院断事官印”^[14]，而且印章左边刻有“大元元年二月礼部造”等字。从亦集乃路遗址内出土的那枚“永昌等处行枢密院断事官印”，是在东街路南的一家店铺内墙根找到的。这方刻有“天元元年”款识的铜官印，表明天元元年（1379）时，屯驻该城的北元军队，是驻扎在已迁走一空的店铺所在的区域，那一带曾是城内繁华的商业区，在战乱中城内的主要建筑物已被大火焚毁，后来的驻军只能驻扎在未毁的民房中。亦集乃城的最后废弃，当时在天元元年以后，那时驻军已将城内的建筑物基本拆毁，所有能用物品都已消耗殆尽，因此在考古发掘中，也就很少有完整的器物出土了。1379 年时元朝已经覆灭，而且黑城被大规模毁坏^[13]，因此也不可能保存该文书。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考证，笔者认为该羊年契约文书属于 14 世纪的蒙古文文书，可以确认其成书年代应为 1343-1379 年间，确切的说是癸未(1355)年书写的契约文书。

黑城出土的各个时代官私文书是真正的原始文献，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面貌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文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亦集乃总管府一带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从而为研究蒙元时期的亦集乃地区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黑城文书有意和无意地留下了真实的历史，不仅印证了正史记载之真实，而且填补了其所载之不足。有些文书对校勘传本古籍更是助益良多，远非一般利用二手资料的研究成果所能比。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研究工作的开展，对蒙古学研究领域拓展，进一步了解元代蒙古文书的书写特征、语法结构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哈拉浩特 (qar-a hota)，又写作“哈喇浩特”、“哈喇拜胜”或“哈喇板升”，汉译名“黑水城”（《元史》太祖本纪，卷一；《大金国志》卷二十一）或简称“黑城”，P. K. Kozlov 称之为“sUnUgsen qota qara qota”（死城哈喇浩特）。黑城是西夏国古都，是西夏政权的一个贸易中心和要塞。据史料记载，“黑水”在党项语中称“亦集乃”，元朝沿用西夏旧称，仍名“亦集乃”，后世异称为“额济纳”。党项人将黑水边所建之城命名为“额济纳城”，也叫黑水城。到了清朝，一般称之为黑城，当地的土尔扈特人则称其为哈拉浩特。

②亦集乃，元代白话文作 ijina，回鹘文作 izina 或 yizina，此语源于西夏语“Idzi Nai”，其中，“Idzi”意为“水”；“Nai”意为“黑”，即“亦集乃”为“黑水”之意。蒙古文文献记载为“Isinai”；汉文史籍记载为“亦集乃”（贾林均《华夷译语》（甲种本）モンゴル语全单语 语尾索引，东北大学东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今黑城遗迹由新旧两城组成，旧城为今黑城遗迹东北角初建的西夏国国都 Isinai；新城为元代忽必烈时期（至元 23 年，1286 年）建成的亦集乃路总管府（F116: w 511）所属黑城遗迹。1886 年，俄国学者波塔宁在额济纳考察时首次发现了黑城遗址。

③他把西域探险中所得古文献整理出版为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P. K. Kozlov《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 хото》. МОСКВА. 1923），莫斯科-列宁格勒，1923 年，第 561-565 页。[俄]彼·库·柯兹洛夫著 王希隆 丁淑琴译《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68-77 页。

④他把西域探险中所得古文献整理出版为《斯坦因中亚第三次探险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Sir Auer Stein en Asie Centrales》，edited by The Henri Maspero, London, 1953），此书第 5 章《西夏和蒙古时期的黑城文书》收录斯坦因在黑城所获元代文书。

⑤1963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曾从沙包中清理发掘出一座新露头的庙宇，发现了一批彩塑佛像，是元代工匠们的杰作。

⑥这两次发掘所得的文书全部刊印于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一书，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⑦由《历日天象》查出，“qubi sar-a”是立春正月节，“正月”（qubi sar-a）为传统月令中的春季首月，“正月，忽必撒刺，qubi sara”（《至元译语·时令门》）；“初五”（sin-e-yin tabun），“新，失你，sini”（《庐龙塞略·通用门》）；“jirGuGan sini”，“doluGan sini”（斯琴朝格图《蒙古语词根词典》，第2950页）。今内蒙古喀喇沁蒙古族中也有此种说法，如：“nigen sini”“tabun sini”等。

⑧原文写为 ousi qoyili，是西夏姓氏，ousi 为姓，即汉文史书中的“嵬宰氏”或“威载氏”（张澍《西夏姓氏录》，民国铅印本，第19页）。

⑨原文写为 mibU sulju，与张澍《西夏姓氏录》的“咩布氏”同一个姓（张澍《西夏姓氏录》，民国铅印本，第59页）。

⑩原文写 buGdai，现代的正词法是 buGudai，借自突厥文，与突厥语“buGdai”写法和意义均同，突厥文常作为“kara buGdai”（拉德洛夫《突厥语大词典》，第4卷第1807页）。在

黑城出土文书当中，将“小麦”记为“buGdai”的情况较多。现在正词法中的“buGudai”。也能从中古蒙古语文字资料，如《华夷译语》（乙种本）“花木门”里“buGudai 小麦 卜兀歹”；《蒙古文分类词典》“谷物类”（第365页）里“buGudai 小麦”。元代史籍中写作为“麦、布歹，buGudai”（《至元译语》“花木门”）。

(11)大麦“noqai-yin qosiGu”《蒙古文分类词典》米谷类，365页。

(12)该蒙古文文书详细内容参见全荣《黑城出土的14世纪蒙古文文书》，《中国蒙古学》，2010年第5期。

(13)元世祖至正23年（1286）设立“亦集乃路总管府”，在原黑水城旧址的基础上扩建，并在城西北角（今黑水城遗址五塔附近）建立“亦集乃路总管府”。归甘肃行省管辖，统领军政事务。“亦集乃路总管府”，蒙古语作 isinai cUlge 或 ejene Goul。马可波罗记此地为 isina。（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释》，第二卷，巴黎，1963年，第214条，第637-638页中古蒙语作 isin-a，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当中作 isina 或 isinai。省 cUlge 于忻都碑，第21行，见伯希和上引书，另见柯立夫《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2卷）。明初，大将军冯胜攻陷黑水城，亦集乃路灭，后明朝整个边防内缩，黑水城逐渐被毁废。

(14)参见黑城出土汉文文书，编号为 Y1: W34。

(15)广积仓（aGuu sang）是亦集乃路总管府下属的收支粮税机构。其建筑遗址为在城内东南隅，

高大墙院内建有储存粮食的大仓房。广积仓官叫大使，广积仓和屯田所都储存有税粮，屯田所设有仓官，负责收支税粮。副使，监支等（李逸友，《黑城出土文》，汉文文书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84、183-185页 F146: W9）

(16)两屯是指军屯和民屯，两屯百户所是负责管领屯田耕作的机构。

参考文献

[1]陈高华《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5）：49。

[2][俄]科兹洛夫著 陈贵星译《死城之旅》，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78。

[3]P. K. Kozlov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 хото》，Moskw，1923。《科兹洛夫考察队黑城所获汉文文献考》，《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69。

[4][日]吉田顺、チメドルジ编《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书の研究》，雄山阁，平成20（2008）年。

[5]《羊年契约文书》，蒙古文，黑城出土文书。

[6]《明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76。

- [7] 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 78.
- [8]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 94. Y1: W30。
- [9]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 183. F135: W71 和 184 页 F135: W72。
- [10]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 183. F209: W29
- [11]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 183. F105: W5; F270: W6; F193: W13 等。
- [12]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 16.
- [13]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 80.
- [12]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 94.
- [13]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 81.

The of 《qonin jil-un gereci bicig》 and its composing time

QUAN Rong

(Inner Mongol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0)

Abstract: 《qonin jil-un gereci bicig》 was unearthed Mongolian document in the 14th century at Hei Cheng. fifth day of the 《qonin jil-un gereci bicig》 was written in the first line of the document. According to its content, this is a contract document of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So, this document was tentatively named 《qonin jil-un gereci bicig》.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were commonly employed to designate the years in ancient China, a recycle was 60 years. But the 《qonin jil-un gereci bicig》 wrote Earthly Branches only, did not write Heavenly Stems. Therefore, according Earthly Branches years only to confirm the completion time of the document presents an obvious challenge. Compare the contents of 《qonin jil-un gereci bicig》 with related Chinese documents, combine some terminology of the document, as bureau names etc, and compare with the documents with sacrificial year, we will combine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to conclude the accurate completion time of the document.

Keywords: qonin jil-un gereci bicig; Contract; Documents; era

收稿日期: 2014-12-15;

作者简介: 全荣 (1976-), 女, 蒙古族, 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硕士, 主要从事历史文献方面的研究。